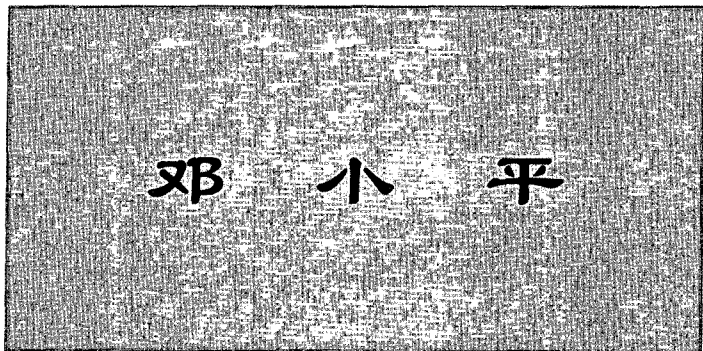


中國工業五十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不是说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吗？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需要回顾一下。

我对外国人说，改革的势头不错，这话正是在北京出现一阵抢购，有半个月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现在看势头还是好的，我总是讲这么个观点。经济体制改革成不成功，成功大小，要看3~5年。见效了才能说服人，证明第二个三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

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

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这项工作很艰巨。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一关把住了，可以减少很多弊端，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此件系邓小平1985年7月11日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谈话的一部分）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1965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从1966~1976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同时，

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现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此件系邓小平 1985 年 8 月 28 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大家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此件系邓小平 1985 年 9 月 23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总会遇到障碍。现在机构臃肿，有的部委据说有上万人，必须精简。否则，这么多人，就要当“婆婆”，揽权。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有一定知识，到基层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要搞企业联合。现在电子工业是否太分散了，为什么不可以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汽车出口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

总之，今年的经济情况不错，比预料的还好。我们的改革是有希望的。

（此件系邓小平 1986 年 12 月 19 日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的谈话要点）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前一段出了点差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我倒觉得，我们是否搞得过稳了。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学生闹事不久，稳一点好，但从长远来说，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

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

（此件系邓小平同志 1987 年 2 月 6 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理顺物价，加速改革

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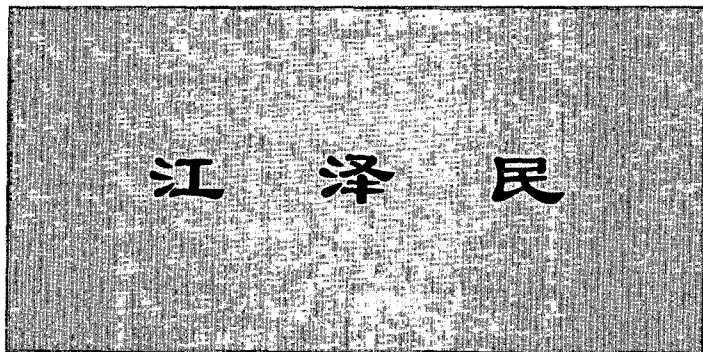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中央，这个决心应该下。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

不了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太慢。1988 年尽管有风浪，速度仍然可能超过 10%。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

（此件系邓小平 1988 年 5 月 19 日会见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七次年会上的讲话

今天，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七次年会在上海召开。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光临上海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对我们上海的同志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各兄弟省市的同志多加指导。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成立已近十年，十年来，在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的组织和指导下，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以及全国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质量管理协会辛勤耕耘，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路子，质量管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刚才好几位专家都讲了，产品质量问题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产品不能只讲数量，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质量问题。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小平同志还说，“工业问题，包括出口产品，要把质量摆到第一位。”1986年，小平同志在审阅十三大报告初稿时又提出要强化质量，他说，“产品质量的好坏，在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民族的素质。”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党的十三大把产品质量问题提到了空前突出的位置。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企业产品质量低劣。必须认识，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好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民族的素质。各部门、各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都要为不断提高我国产品质量而努力。”

我们党之所以如此强调质量问题，根据我的理解，是不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产品有没有使用价值，首先在于这个产品能否满足某种现实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质量。如果质量非常低劣，或者货不对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效益就没有前提。对整个社会来说，这就是极大的浪费。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实行统一调拨，统购包销，“皇帝女儿不愁嫁”，使得“生产必须符合需要”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往往得不到严格遵守，所谓“生产报喜，仓库报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三年困难时期，我在一机部研究所当所长时搞过一段清仓核资，曾清理出大量继电器、接触器、电器仪表等产品全部是一堆废品，都成了无效劳动。我们建国已经40年了，相信在座的同志在不同单位、不同程度上都感受过这类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机制日益发挥作用，如果产品质量不好或者不适销对路，就会在竞争中被打跨。

第二，现在我们沿海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说到底还是产品质量和科学技术的竞争。刚才，季文同志再三强调提高质量，创名优产品。从产品销售角度证明，名优产品与非名优产品卖价差别很大，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这种价格差距可达数十倍。比如上海有些轻工业产

品，在国内市场质量似乎已经蛮好了，可是因为产品包装还不大灵光，在国外比较有名的超级市场一看，只能摆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再比如，我们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收录机质量很好，卖给索尼，每台卖价只 37 美元，经索尼一转手，贴上它的商标，每台卖价就可达 80 多美元，这就是名优牌子的“无形价格”。我们来上海工作后，都非常强调产品质量，我们要求上海原来的名优产品要继续保持，同时要创造新的名优产品。

现在时兴横向联合。上海的“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都跟兄弟省市搞了联合。名牌产品搞横向联合有个牌子问题。我有个基本观点，搞联营，首先要符合原来的质量标准。其次，要在产品上注明产地。这也是国际惯例。比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同联邦德国联合生产“桑塔纳”轿车，在“桑塔纳”的牌子旁边，必须注明“Shanghai”。巴西出的“桑塔纳”也是如此。这样做是考虑到这些名牌产品的分支机构万一出问题，不致影响到它的总部大本营。另外，大本营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质量，否则名牌怎么保得住？怎么能开发新产品？联邦德国还有一条也很厉害，他们的名牌产品虽然很畅销，但它也往往控制一定的生产数量。1978 年，我随中国政府的机械工业代表团到联邦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参观。当时我对该厂董事长讲，你们有技术优势，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便宜，可以合作生产“奔驰”轿车，以质优价廉去赢得市场。那个董事长听后愣了半天，最后才说：我们“奔驰”车的卖价不能下降的。我们就是一靠质量精益求精；二是控制一定的生产数量，所以直到现在为止，买“奔驰”车都是要事先预订的。他这一条很过得硬，越是名牌产品，越是要稳定数量、提高质量。从上海来讲，国家要求我们多创名牌产品，不仅要创国内名牌，还要创国际名牌。名牌产品不必垄断，可以搞联合。但联合也一定要注意提高质量，稳定数量。本来在今天这样的全国性会议上，我讲这个问题很有顾虑。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全国一盘棋”，保护名牌产品的声誉，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归根结底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现在上海地区出口产品的 80% 是工业产品，这是提高上海国际竞争能力的主体。但是，现在我们工业品质差是一个致命弱点。就全国的情况来看，据说，在总共 7000 多个国家技术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还不到 30%。目前，发达国家的机电产品，有三四十万个品种，而我们只有 3 万个左右，而且大部分是标准低、结构老、性能差、耗能高的产品。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1985 年我国机电行业中达到国际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产品，只有全部产品的 6%。我们说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的落后上。过去，我们上海工业战线一些同志有“老大自居”的思想。但是现在上海工业正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由于技术和产品质量上的差距，上海显得力不从心。工业普查资料表明，上海主要工业局的主要设备技术达到国际水平的大多在 20% 以下，有的还不到 1%。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搞活，一些兄弟省市通过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日益缩小了与上海的差距，并在有些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上超过了上海。季文同志告诉我，现在江苏无锡生产的羽绒服，不仅产量比上海多，而且质量也比上海好。

对于兄弟省市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和进步，我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谓“一则以喜”，是因为上海也是中国的上海，我们欢迎兄弟省市超过上海。但是我一再对上海的同志说，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抱着“阿 Q 精神”，自己原谅自己。在这方面，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所谓“一则以忧”，就是要看到，上海与兄弟省市日益缩小的差距背后隐藏的危机。所以，这若干年里，我们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要狠抓产品质量。我本人要求上海有关部门搞一些比较研究，把同行业、同一种产品的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搞成对照表，明确差距，急起直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多次重要指示，党中央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体上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现在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党的十三大把我国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为什么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战略，而不能实行另外的战略呢？我的理解，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条件和存在的客观矛盾。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难关，一个是人口众多的压力，一个是资金严重短缺和资源相对不足的约束。突破这两大难关，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经济效

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改变过去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的发展战略，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并取得了多方面成效。但是，不顾效益、片面追求速度的惯性和传统观念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传统模式下效益差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据世界银行计算，我国工业工人平均占用的固定资产比一般低收入国家高出 40%，而净产出却只多 17%；在制造业中，我国工人平均占用的固定资产比一般低收入国家高出 4 倍，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净产出只比一般低收入国家多 50%，还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这既是我们经济困难和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主要根据。

对我们上海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上海虽是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但一无原材料，二无能源。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提高经济效益，首先是要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本市产品质量水平，同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部分产品也落后于兄弟省市，只有奋发图强，才能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更好的适用产品，以质量求生存，使上海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第四，提高产品质量，这也是贯彻治理、整顿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治理、整顿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秩序的混乱。现在有些企业中出现的忽视产品质量的短期行为，市场商品出现的一些影响国计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是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来看，总的来说产品质量都要提高，但有的乡镇企业在这方面恐怕存在的问题更突出一些。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目前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但某些乡镇企业经营指导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产值利润，忽视产品质量，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乡镇企业也要狠抓质量，搞一个正常的速度。加强质量检验机构，严格把关，要有一批人办这件事。这一点抓好了，可以减少很多矛盾”。我们应当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去办。现在有个别乡镇企业见利忘义，制造假冒商品，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我认为，对不管什么工厂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电器产品与食品、药品，必须更加重视它的质量。因为这些产品的质量好坏关系到人民健康和人身安全。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五，提高产品质量，关键是加强管理。吕东同志在《最重要的是产品质量问题》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是加强管理。企业管理工作落后，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松懈，产品质量不可能提高。因此，要确保现有产品的质量和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必须从加强管理入手。我很同意这个意见。当前在加强质量管理方面，我认为应当着重抓好四项工作：

1. 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真正树立“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思想，各个企业都要在深化改革、增强活力的过程中，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增产节约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这方面，我们上海做了一些工作，在贯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提高产品质量、采用国际标准、加强计量工作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治理、整顿方针的贯彻，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们在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因此，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我们要继续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真正做到全国第一流的产品质量。

2. 要切实加强质量管理和监督检验工作，采用国际先进标准，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不仅要改进企业的管理，建议也要改进国家的管理。就企业的质量管理来说，要以“上等级”为中心，加强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要加强全面质量管理，从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进厂，产品设计、制图到配料、制造、组装、出成品直到售后服务，都要有一套质量管理制度，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同时要在奖惩制度上坚决实行严格的质量责任制和质量否决权，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能出厂。就改进国家的质量管理来说，建议除了坚持产品创优评优制度以外，要尽快把国家和地区两级产品质量监督和检测机构网络建立起来，对生产和流通领域里的产品质量实行有效的检查监督，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加快采取国际先进标准的步伐。

3. 在当今技术突飞猛进、竞争不断的加剧的情况下，要想提高产品质量，必须下决心抓好从干部到职工的技术培训和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增强提高产品质量的责任心。这要作为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的重要内容来抓。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提高产品质量意义很大。美国有一家莫托罗拉公司曾投资

20 万美元，培训了一批机械工程师，结果为这家公司带来了 600 万美元的额外利润。现在这家公司已规定，其所属各部门至少要拿出相当工资总额 1.5% 的款项作为职工教育基金。

4. 要加强对质量管理的理论研究。我们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已经十年了。这一科学管理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我们要认真加以总结和推广。我国的全面质量管理要继续深化。在座的都是质量管理专家，我们上海要和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们一道，更好地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虚心学习各兄弟省市的经验，同时认真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悉心研究改革开放形势下质量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质量工作的规律，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体系，造就一大批质量管理人才，为提高我国产品质量，振兴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件系 1989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质量管理协会第七次年会上的讲话）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就大家讨论中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讲点意见。

一、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多年来我国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我们的路走对了。今后十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这种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丰富和发展。

这次会议通过的《建议》，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阐述了 12 条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丰富经验的概括。实践证明，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原则具体化、制度化，使它们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所掌握，使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作好。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

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要创造。通过改革开放，纠正过去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同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力。这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贯穿着改革开放的精神，再次强调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改革既要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传统，并且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地有所创造。如果不坚决改变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和办法，革除过去体制中的弊端，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要通过改革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比如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大中型国营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眼前，国家、集体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利益关系。改革一定会涉及这些利益关系。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激发各方面创造精神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办一些大事情的优越性。这就是说，既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又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中央一再强调，治理整顿不仅为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且治理整顿本身也需要贯彻改革的精神和在深化改革中进行，二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在治理整顿中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深化改革的措施，要抓紧落实。

在改革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工作。

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要进一步办好已有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要办好上海浦东新区，充分发挥上海和长江沿岸腹地经济资源和科学技术的优势。同时，还要考虑有重点地选择一些边境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要以对外开放地区为依托，发展外向型经济，外引内联，带动内地经济、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对外开放中，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同时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制度那些消极腐朽东西的侵蚀。

三、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

《建议》提出，要在今后十年中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且提出了需要把握的若干要点。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继续探索和积累经验，在理顺各种复杂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和办法。

四、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问题

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搞好多中型国营企业，充分发挥它们的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大中型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梁。它们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目前我们能否克服财政的困难，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现在财政困难，问题主要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效益低。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必须从改善外部条件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来解决。普遍提高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效益，增强它们的发展后劲，应该作为搞好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来抓。从明年起，国务院要专门研究和部署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各部门也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改善宏观管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外，还可以多利用一些外资搞技术改造，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准了，就应该坚决把它解决好。

五、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

我们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提倡先富起来的帮助还没有富起来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在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主要体现在这里。经济发达的省、市和地区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发展本省、本市和本地区的经济。经济不发达的

省、自治区和地区，也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经济。经济发达的省、市和地区要通过横向联合、技术转让等经济办法，来帮助经济不发达的省、自治区和地区。这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并逐步形成具体的措施、办法。

六、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

我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要继续贯彻中央关于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的方针。

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抓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越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越要强调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人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提高了，改革开放就可以搞得更好、更有成效。

（此件系江泽民 1990 年 12 月 30 日《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下，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我国现阶段，适应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首先要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时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政策，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他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力量，它们的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富有生机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第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

经济实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要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当前在收入分配上既存在平均主义现象，又出现了过分悬殊现象。这种分配不公的问题，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属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劳动工资制度的逐步改革加以解决。其他分配形式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完善有关政策和法规加以解决。要继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提倡先富帮后富。我们保护合法收入。对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对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行为，要依法坚决取缔。现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必须努力改进。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通用做法，但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对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在前几年的改革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今后要继续探索，进一步寻求结合的具体途径、形式、办法和措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此件系江泽民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切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李鹏同志已经讲了，讲得很全面。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我再讲几点原则性的意见。

一、要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件大事，摆到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抓下去

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繁荣与稳定，也不可能有政治的稳定。前几年我们采取一些优惠政策，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是必要的。我们还要继续引导它们健康发展，使它们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十多年来，集体企业有很大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也有较大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困难比较多，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涉及经济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今后我们要集中力量切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使其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二、要把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体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这种速度，要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没有一定的速度，经济搞不上去。但是忽视效益的速度，会造成浪费，增加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也不能持久。历史经验证明，在经济工作中，主观上的急于求成必然造成片面追求速度，不讲效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下功夫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把扩大再生产的重点放在技术改造上，而不能主要靠铺新摊子。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当然，在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方面还要上一些新项目。上这些项目，也要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

中央提出要从内涵上扩大再生产，防止搞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重复引进，这些话讲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不大。究竟为什么呢？除了体制上的问题以外，恐怕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主要用产值和速度衡量经济工作的成绩有关，同有些地方和部门片面强调局部利益有关。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盲目追求产值，而要推动企业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合理地组织生产。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效益意识。今后衡量经济工作的成绩，要重视采用综合性的考核指标，要看产值和速度，更要看是以什么代价获得的产值和速度，看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质量合格、适销对路。绝对不能追求不讲效益的速度。要下决心关停并转那些效益低下、没有前途的企业。

三、要给国营大中型企业逐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李鹏同志讲话中提出的十二条改善国营大中型企业外部环境的具体措施，都很重要。讨论当中，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即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要积极地开拓有效的市场，促使企业有活干。问题是如何去开拓市场，如发展商品房建设，推动企业技术改造，限期更换一部分耗能高耗材多的设备和产品。更换一些老设备，看起来有些可惜，但不这样做，那些“电老虎”开动起来，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增加电力的基本建设、煤矿的基本建设，去满足对能源的需要。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和发达国家相比要高得多。所以，不仅要限期更换一些设备，有些过分落后的、耗能高的产品也要限制生产，逐步用性能有所改进的产品去代替，还要开发一些适销对路、不会形成积压的产品。我们还要扩大出口，多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总之，要开拓使投入的资金能很快收回或还贷的市场。开拓这样的市场没有风险，有可能一动百动，财政可以增收，企业困难也可以减少。要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不必要的检查、评比、达标、升级，让企业管理人员专心抓生产经营。要严禁各种不合理摊派，减轻企业负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全局，加强宏观指导，为基层着想，为企业服务，努力提高办事效率，认真落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各项措施。还有企业办小社会的问题，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社会化服务，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方向上讲还是要逐步实现政企职能分开，该由政府管的事，政府把它管起来；同时，要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四、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挖掘内部潜力，自立自强

企业要在提高职工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下功夫，抓好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不断挖掘内部潜力。当前企业确实困难很多，但决不能说潜力已经挖尽了。

关于国营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问题，概括起来是三句话：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要把企业建设好，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三条，是我们四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企业领导体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准确地反映了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全面理解，全面贯彻实行。

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从严治厂，加强民主管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充分调动

广大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企业的命运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真正地体现出来。现在有的国营企业已经亏损了，奖金还是照发，甚至还要提高。这样下去就会坐吃山空。所以，我们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把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向工人讲清楚，发动全体工人共商大计。这次会上大家都提到，凡是企业的大事，都要同工人商量，使工人知道，如果不好好搞，大家都要受损失。个人收入的增长应该建立在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提高效益的基础上。这一点应该向群众讲清楚，要相信群众。如果不讲清楚，他就以为同他没有关系。有的同志发言中还提到，现在有的厂长在任期之内搞短期行为。要教育干部和职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五、发展经济、搞好企业，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同志提出十大关系以后，我们党一直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只有一个积极性。只有中央的积极性，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只有地方的积极性，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建设项目就会受到影响，宏观可能失控，经济不可能顺利发展。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也不容易。这十多年来，通过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改变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状况，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前几年也出现了宏观失控的现象，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宏观调控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很难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很难有好的效益。解决这个问题，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有全局观念，不能仅仅从地方或部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今后考核干部，除了看他们对本地方、本部门做了什么贡献，还要考核这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看他们对全局做了什么贡献。

这里我想重申两点。一是中央必须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以便把地方办不了、只能由中央办的事情办好。如这次抗洪救灾，事情就很明显。难道只让江苏、安徽自己去干，国家就不管了？这当然不行。我们的国防建设，也必须由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去办。二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新上的基本建设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综合平衡，不能盲目拍板。要杜绝首长批条子上工程的现象。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上项目必须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而不是去做“可批性”研究。我们的省，大的有上亿人口，一般也有几千万人口。各省区市的领导同志都要研究综合平衡问题。中央和省这两级把综合平衡搞好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就会比较协调。发挥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该分散的一定要分散。历史证明，宏观失控，全局不稳，你那个地方、部门的事情也难办，经济一时上去了也维持不久。历史也证明，只强调集中，管得过死，就不可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情也办不好。我们有30个省区市，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面积，11亿多人口，情况千差万别，认识不到这个差别，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六、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并把它纳入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抓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不但没有停顿，而且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方面，结合治理整顿，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开放措施。另一方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已经出台的改革开放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对于这几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当前，我国人民面临着最根本的任务，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生产力，关键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开放，主要是做好三个方面的文章：一是发挥我们已有的优势，

二是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三是适应新的情况勇于创新。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在这三个方面，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我们逐步认识到，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必须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已经写入我们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怎么样结合，这几年的实践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下大功夫去继续探索。我们一定要把计划经济的长处和市场调节的长处很好地结合起来，千万不能把二者的短处结合起来。要扬长避短，走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路子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去办，决不能再动摇。

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改善企业外部环境两个方面，都离不开深化改革。要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搞好企业自身改革，在经营决策、机构设置、内部分配、劳动用工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建立企业的经营机制、激励机制、自我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逐步理顺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

七、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既要抓紧工作，又要有长期打算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有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因此不是一年两年能完全解决的。这次会议进一步理出了一些思路，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要继续研究。李鹏同志报告中提出，把整个“八五”计划时期列为集中力量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益的时期，我同意这个意见。把问题看得复杂一点，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同时一定要积极抓紧工作，这样比较主动。

这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说明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希望各级党委、政府也一定要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把国营大中型企业和整个经济工作搞好。

（此件系江泽民 1991 年 9 月 27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历史经验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1990 年底，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不控制？有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就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简明更深刻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